

舆论中的中日关系：症结与分析

□吕耀东

内容提要 后冷战以来,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带来了包括社会舆论和相互认识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与碰撞。同时,舆论也是体现国家意愿的直接决定因素之一。本文从社会舆论“三极模式”的分析方法角度,研究了日本媒体对华舆论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政府决策与公众的倾向,认为日本对华舆论“倾向化”与日本国民意识变化有相关性,也反应了日本政治在后冷战以来“总体保守化”的基本格局。因此,本文对分析中日关系的现状与症结,以及中日双方调整对策提供了量化的材料依据。

关键词 舆论分析 中日关系 媒体责任 症结 对策研究

21世纪初期,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就必然带来包括社会舆论、价值评价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与碰撞。日本传播学家伊藤阳一教授在《日本与美国的大众传播》中提出了社会舆论“三极模式”(Tripolar Model)。该模式认为,“传媒、政府和公众是三支最重要的力量,舆论就是以此三者为主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很显然,公众舆论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社会舆论是体现国家意愿的直接决定因素。”^①可是,“舆论是一种非常难以进行确切地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它是同人的社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②民意调查可以将这种看似无序的社会舆论,“以一种客观、系统、科学的方式加以聚焦化呈现,”比较正确地反映社会舆论的客观实在性。这不仅

能准确反映中日关系的现状与症结,而且也能为调整双边对策提供量化的材料依据。

一、中日民意调查结果:两国互信下降

民意调查“以科学的眼光观察社会,给公众一个量化的真实。”中日两国有关部门和新闻机构进行的民众舆论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表明:两国互信下降。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两国的亲近感形成巨大落差。中日社会舆论的变化状况,不仅表明中日关系进入一个困难时期,也预示着修复两国关系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本文以中日两国近年来的民意舆论调查,作为分析中日关系症结与出路的样本。

① [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著,王玉珍等译:《世界政治》,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编:《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1年版,第144页。

1. 中国对日公众舆论的现状

2002年和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了两次中日舆论民意调查。^①其结论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强。两年来,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仅由5.9%微升至6.3%,而感到“很不亲近”和“不亲近”者却由43.3%猛增至53.6%,^②即已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对日本抱有不亲近感。该调查结果引起了中日相关各界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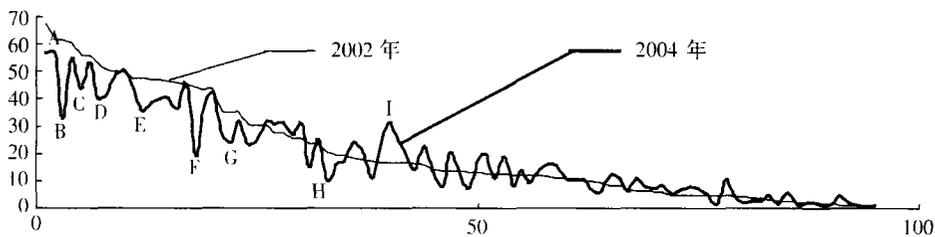


图1 2002年与2004年中日舆论调查结果比较

如图2所示,本次调查中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共186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6.3%,其比率比第一次调查微增0.4%;而感到“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共1604人,占53.6%,比第一次调查增加了10.3%,并已超过半数。因此,可以说,两年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强。2002年和2004年中国民众的对日不亲近感比较如图3所示。

在感到“不亲近”、“很不亲近”的理由(100%)中,选择“日本近代侵略中国”者占

1985年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者达75.4%,到2001年已下降至47.5%,而没有亲近感者则超出有亲近感者0.6%。

图1是两次调查结果的比较图。将两次调查中可比较的95组对应百分比,以第一次调查百分比降序排列为基本参照,可以明显看出第二次调查的对应百分比亦呈降序排列,二者的发展趋势明显呈同步吻合状。这是两次调查所具真实性、合理性的表现。

26.0%，“日本至今没有认真反省侵华历史”占61.7%，“日本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占6.9%，“曾留学或访问过日本”占0.2%，“本人或亲友与日本人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占0.7%，“其他”和“不清楚、不回答”分别占1.2%和3.3%。不难看出，被调查者在思考对日本感到“亲近”或“不亲近”的理由时，主要不是从个人的感情和恩怨出发，而是由历史观所主导，政治观和经济观也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一结果与第一次调查结果相同。在“你认为目前中日关系

^① 调查分别发放调查问卷3400份和3300份,收回有效问卷3157份和2987份。两次调查范围广大,调查地选择了除了西藏及港澳台外全国各省(直辖市)220余个市州县,调查范围和被调查者几乎涉及整个中国,具有充分的普遍性。被调查者包括各年龄层的中国公民,调查显示,21—30岁者(31.9%)占相对多数,其后按年龄增高依次递减,反映出被调查者总体上是年轻人,代表中国公民最活跃的群体。从被调查者的性别构成来看,填写性别者中男性1709人,女性1371人,分别占55.5%和44.5%。从被调查者的职业和收入构成来看,在填写职业者总数中公务员占10.7%,工人占16.7%,农民3.2%,军人7.2%,科技人员9.7%,经营者4.7%,职员19.2%,学生18.8%,其他9.8%;在学历方面,具有小学、中学及大学以上学历者分别占填写学历者总数的3.0%、36.2%和60.8%,大学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比要高一些。另外,将两次调查进行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次调查的对应百分比呈明显同步吻合状态。充分这是两次调查的真实性、合理性。

^② 蒋立峰:《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有亲近感》,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6期,1-2页。

如何?”的选项中,认为“良好”或“不好”者分别为 19.8%和 19.3%,两者所占百分比大体相当。43.8%的被调查者认为,中日两国关

系现在处于“不好不坏”的状态。同样,对于中日关系抱“非常好”与“很不好”两个极端的人只有 1.3%和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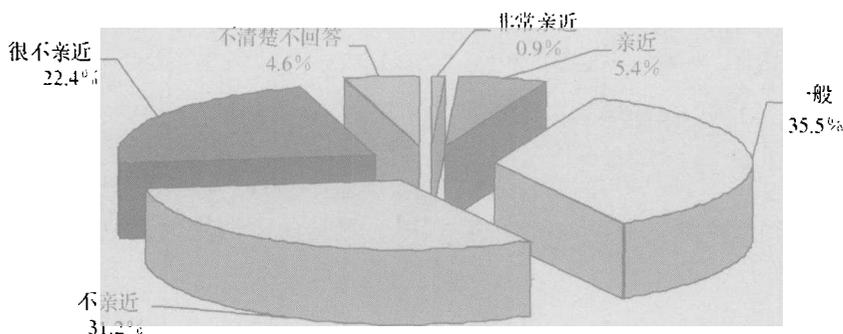


图2 2004年中国民众的对日亲近感调查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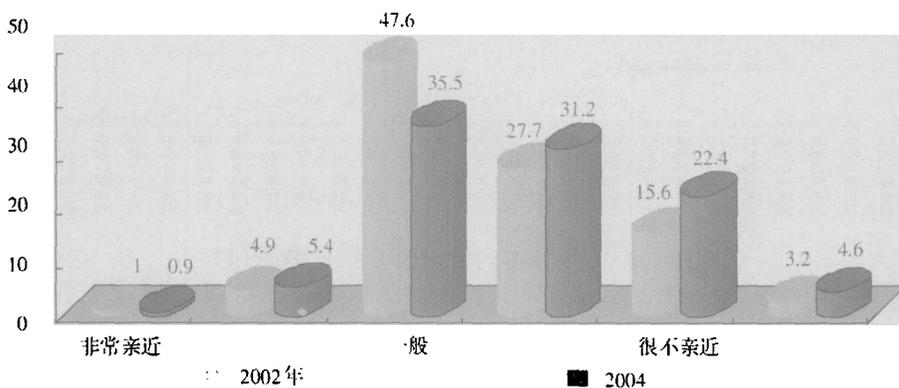


图3 2002年、2004年中国民众对日不亲近感调查结果比较

2. 日本对华舆论的状况

很多日本的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都很看重“民意”。“首相办公室中负责公共事务的机构收集那些公共或私人机构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很多政治家和官员把民意调查看作是全民公决的替代。他们对此予以很大关心。”^①

2004年12月,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②结果,该最新调查以日本全国20岁以上3000名成年人作为调查对象,在关于日本外交为内容的社会调查中,有2067人

(68.9%)做出了回答。关于“你现在对中国是否抱有亲近感”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回答“亲近”者为37.6%,比2003年的47.9%下降了大约十个百分点;回答“不亲近”者为58.2%,比2003年的48.0%上升了大约十个百分点(图4),并且回答者大多集中在20多岁的年龄段上。“对中国是否抱有亲近感”是历次日本对外关系舆论调查的核心问题。关于“你认为目前中日关系如何”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回答“良好”者仅为28.1%,比2003年的46.9%下降了大约二十个百分点;回答

① [美]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划与国家安全》,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6页。

② <http://www8.cao.go.jp/survey/index.html>

“不好”者为 61.0%，比 2003 年的 42.9% 上升了大约二十个百分点(图 5)。回答者大多集中在 40 岁左右的年龄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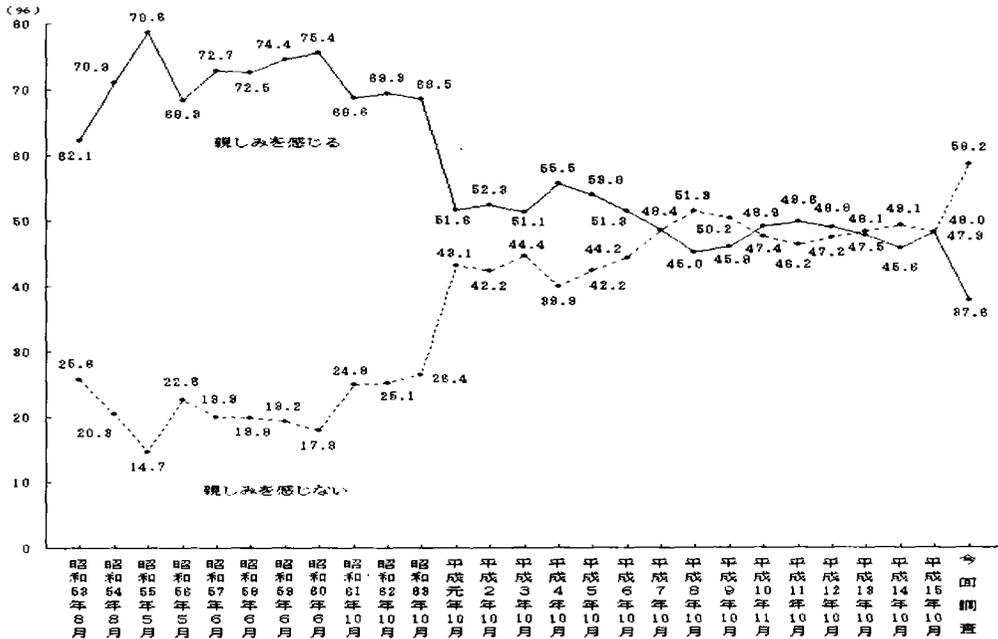


图 4 2004 年日本内阁府外交舆论调查(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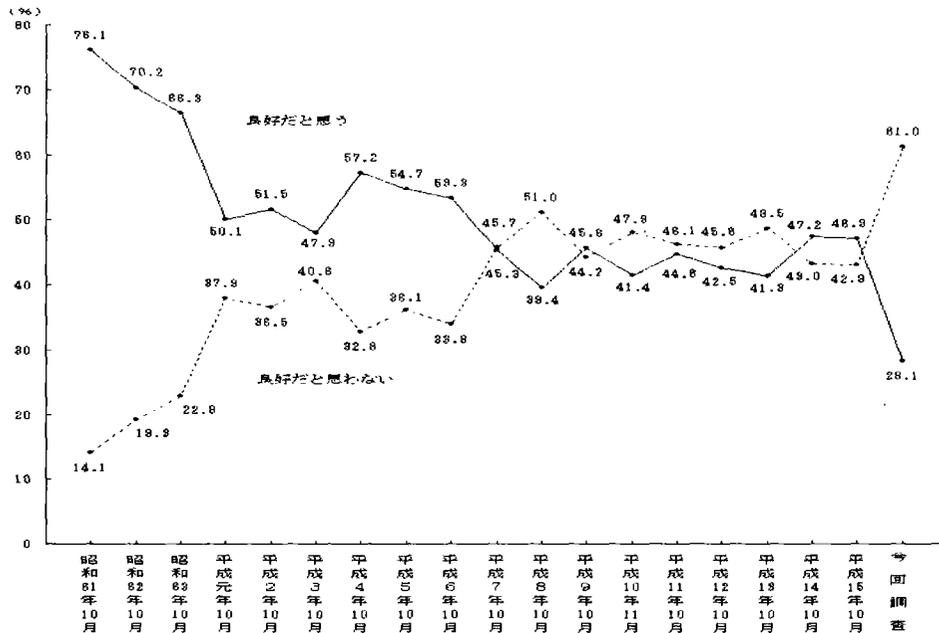


图 5 2004 年日本内阁府外交舆论调查(2)

另外,日本内阁府在 2001 年公布的“社会意识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该最新调查以

日本全国1万名成年人为对象,其中有6929人做出了回答。),在回答“未来日本人是否应更重视国民整体利益”时,有35%的人认为“比起个人利益,更应该重视国民整体利益”,而认为“应更重视个人利益”的为28%。^①重视国民整体利益的日本人超过看重个人利益的人,而认为自己有强烈爱国心的人数也没有明显减少的趋势。这一社会现象表明,在日本社会舆论的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极模式”中,公众、政府和媒体的互动依旧顺畅,日本大多数国民仍然是日本保守主义政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同时,这次日本政府的社会意识舆论调查还显示,认为“比他人有更强烈的爱国意识”的为46%;而回答“爱国意识比他人要淡薄”的为11%。这样高百分比的“强烈的爱国意识”极易容易和日本政坛的政治右倾化形成互动,认同“有事法制”,产生类似“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和行动。

二、日本对华舆论分析

日本对华亲近感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传播学家伊藤阳一教授认为,在日本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政府和公众三极相互作用和影响,就会形成社会舆论。他把大众传播媒介、政府和公众作为影响社会舆论的最重要三极。“三极模式”中的三极是相互独立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是一极决定或支配其他两极。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社会舆论。可以说,民意调查作为社会舆论的“聚焦化呈现”也就是以三极为主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的结果。它较准确地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华舆论的产生过程及状况。

1. 日本“总体保守化”及政府注重引导民意。日本“总体保守化”是否认侵略历史的政治根源。日本的“总体保守化”是日本各主要政党的政策趋向于保守党(自民党)政策的进程与表现。这一过程表现为保守主义执政理念的张扬,并且导致日本在政治上的右倾化。政治右倾化的主要表现就是纵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否认侵略历史。这种政治现象已经被一些保守党政要的言论与行动所证实。2004年4月,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就发表过担忧日本政界右倾化的演讲,指出,“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的议论之声高涨,强调爱国心的主张越来越强烈,这都是右倾化的表现。”其中,“强调爱国心”切中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要害。因为,日本保守势力偏执地认为,日本要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理想,就需要恢复日本往昔的“雄风和自信”,忘掉“历史阴影”,重新打造日本的“光辉”形象。所以,他们就通过“强调爱国心”来推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结论、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拒绝向被侵略国家和人民反省和谢罪。日本一些保守党政要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正是日本“总体保守化”的体现形式。日本“总体保守化”必然导致政治右倾化。日本政治右倾化否认侵略历史的种种表现和迹象,是日本保守政党保守主义执政理念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日本政府通过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等政治右倾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国家意志的流露和表现。

日本政府通过充满谎言的历史教科书严重误导日本新生代。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征集中学历史教科书书稿,然后经过审查、批准、放行。其中的不少历史记述严重失实,特别是由日本一些右翼学者组成的

^① <http://www8.cao.go.jp/survey/index.html>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中学教科书肆意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日本文部科学省虽然对这些送审的历史教科书书稿进行了修改,却大量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史实。“文部科学省在核准教材,进而影响学校课程设置中享有很大的权力。在历史和社会研究中,对于太平洋战争有争议的问题,文部科学省常常采取回避态度。”^①日本政府辩解道:“这些教科书不是国定教科书,不能进行政治干预。”然而,按照批准程序,日本审定中学教科书的机关是文部科学省,主管负责人是文部大臣。教科书书稿一经审定合格,文部省就给相关出版社发出“合格”通知书,出版社便可拿着样本上市征订和印刷、出版。日本文部科学省利用审定教科书的权力,间接导致“皇国史观”的复活,使不少日本新生代不知或不愿承认日本曾对他国犯下的侵略罪行。

近年来,日本“总体保守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革新的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被严重削弱,自民党和民主党等新旧保守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得到释放,“中国威胁论”“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普通国家”的呼声与行动日益强化。大有被日本媒体和公众认同的趋势。

2. 日本媒体对华舆论影响政府决策与公众的倾向。日本媒体常常“是诠释民意的主力军。这种制度化的传播方式对日本政治非常重要。有时候,日本媒体会发挥民间社会的功能,使得执政党能够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保持执政地位。”日本社会的信息资源非常丰富。《读卖新闻》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即使主要针对商业人士的《日本产经新闻》也有 27 个不同的早晨版和 4

个晚上版。“以人均收入衡量,日本报纸拥有的读者居世界第一。每一家日本的媒体集团都覆盖了电视、广播、有线电视和印刷业。”^②在某种特定的国际环境下,若日本社会具有明显倾向性和指向性舆论时,日本庞大的媒体势力就会使其发挥到极致。

近几年来,随着日本社会走向“保守化”、对华批评尖锐的倾向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各种媒体。日本的全国性报纸杂志上发表此类言论较多,不仅保守刊物《产经新闻》、《诸君》、《Sapio》刊发,就连自诩中立的《读卖新闻》、《文艺春秋》等刊物也刊登这类文章。而一向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主张客观看待中国的《朝日新闻》、《世界》月刊和《论座》等有影响的月刊,在力求“客观评论”中国的同时,也常用“人权”“民族问题”和“扩军”等概念来批评中国。在出版界,抨击中国的书更是远多于客观评价的书,并且颇为畅销。日本舆论对中国的倾向性误导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用资本主义来批评社会主义变得“理直气壮”;二是美国等误导的对华认识盛行,日本舆论也随美国舆论加强对中国“人权”“民族”“扩军”等的批判;第三是用本民族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分析判断中国的情况。^③

当今日本社会中,媒介和政府产权等方面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媒介不得与政府保持一致或沉默。如 NHK 广播公司的官方性质和一些商业性媒介的摇摆性,都制约了大众传播媒介批评监督作用的独立发挥。

3. 日本对华舆论“倾向化”与日本国民

① [美]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划与国家安全》,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② [美]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划与国家安全》,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③ 朱建荣:《日本的中国观——冷战后的变化与趋势》,《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3页。

意识变化有相关性。在社会舆论“三极模式”中,公众对于形成社会舆论的作用非常关键。基于本文中社会舆论分析是以两国民意调查为准,所以,这里以日本民众“中流意识”的政治功能为例分析。日本社会的“中流意识”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的社会阶层改观的假象,经济的增长给人们带来的福利,使得日本中下层民众因暂时的生活改观,产生“中流意识”的错觉。日本国民个体的“中流意识”形成国民的整体社会意识,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认同转化成为对日本民族以及整个国家的自信和肯定。这样的群体意识必然反映到了日本的政治层面上来。

(1)认同执政的保守政党及其对华政策。“高速增长长期生活水平的上升、社会移动的增大使阶级的非构造化产生了多样的中间层。人们的意识转向了保护已得到的地位,维护福利制度的权益及商业界、农民、店主、专业团体等各种各样利益团体的权益成了政治上的焦点。自民党摇身一变成了保护这些权益的政党。”“自民党把政策的对象也转向了城市消费者。由此成为真正的利益指向型政党”。^①经济的发展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普遍的实惠,过去对革新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支持,变成了现在对保守党联合政府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根源于对日本保守政党现行政策所带来的“中流”生活水平的承认和接受。“再加上安保斗争受挫后进步知识分子、文化人的转向,学术界和舆论界肯定现存制度而批判战后进步思想的风气与日俱增,具有‘中流意识’的大多数国民开始转向肯定现行体制。”^②日本国民形成这样的群体意识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且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这种意识反映到政

治层面的表现是认同和支持保守政党及其政策,放弃对革新政党及政策的认同。而且,“大多数国民已经基本接受了保守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并明显呈现出‘总体保守化’倾向。”^③

(2)日本国民“沉默大多数”对政治右倾化的默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民的“中流意识”已经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演变为“大国意识”,“逐渐接受了安保体制和自卫队”。尤其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正经历战后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国民精神也陷入“全国螺旋性下降”的状态中,对政治的失望而渴望强权人物的出现。当日本政府倾向于政治右倾化,媒体也推波助澜的时候,日本公众不是认同者就是“沉默大多数”,反对者少之又少。“中流意识”演变为日本国民“总体保守化”,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右翼势力形成和扩展的土壤。这样就形成了对于“修宪”“普通国家论”“中国威胁论”等言论的认同和肯定。近年来,对于日本保守执政党的民族保守主义政策,如对“周边事态法”“国旗、国歌法”和“侦听通讯法”等法案的默认,就充分说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国民基础。

三、中国对日舆论分析

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因而两国社会舆论的“三极模式”中大众传播媒介、政府和公众三极的强弱不同和路径有所不同。

如果说现在中国社会舆论的形成已经具备“三极模式”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市

① [日]今田高俊著,赵华敏译:《社会阶层与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② 崔世广等:《再生还是衰落——21世纪日本的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③ 张广宇:《“石原现象”与日本国民“总体保守化”》,载《中国青年报》,2000年5月19日。

场经济尚未确立之前,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政府和公众三极高度一致化。其原因从国际来讲主要是冷战时期需要政府、大众传播媒介和公众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一致。从国内来讲,计划经济也造就了“一个声音说话”的模式。所以,当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从而结束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在对日政策上体现出高度一致。当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社会舆论的形成模式开始从“单一模式”向“三极模式”过渡。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市场经济促进了大众传播媒介企业化意向和公众独立人格及主体性的形成。

1. 对日舆论受到中国公民意识增强的影响。公民意识增强根源于公民的主体性人格的确立。其主要是指公民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元化和国家与社会的初步分离,个人的相对独立性相对加强,新的社会力量、角色群体开始产生并日渐活跃。”^①这样,中国社会舆论变化的最大特点是由过去的“一个声音说话”逐步转变为“畅所欲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较为稳定的传统人格结构趋向于动态转型,表现出公民意识明显增强,并深刻地反映在公众力量(民间力量)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上,显著地体现在我国当代公民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状况上。其结果充分体现为民意在社会舆论中的突出作用。民意是人民意识、精神、愿望和意识的总合,是社会的主导意见。它是一种具有公正性、整体性和顽强性的意志,^②当在历史、领土、台湾、经济和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成为中日两国摩擦和舆论的焦点的时候中国公众的意志表达就会在对日舆论中充分反映出来。

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公众人格主体性的确立,为中国民间舆论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网络传媒成为对日评价和舆论表达的主要平台。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介是社会舆论传播最理想的形式,它具有传播信息、反映社会民意、引导社会舆论和广泛影响社会舆论的功能,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舆论所要求的各种条件。互联网的特点是资源共享和交流互动,是大众媒介中最直接的思想表达形式,它在所有大众媒介的形式中,在反映社会舆论和影响社会舆论方面,应该是更为理想、其作用也更为直接的一种。网络舆论是传统社会舆论的延伸和发展,是伴随网络的发展和网民的增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近年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网络舆论逐渐形成。由于网络传输的广泛性、快捷性、即时性和交互性,使得网络舆论可以迅速形成并广泛地影响到网民,再由网民散播到社会,对社会的影响日渐增强,已经引起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网络舆论往往是围绕社会热点话题展开或扩散的。围绕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遗留化武伤人事件等诸多事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形成网上的强大抗议活动。这些讨论都紧紧围绕中日关系热点问题展开,又通过网络迅速地散播开来,网络舆论的声音越发强大。网络舆论以其形成及时、传播迅速的形式,使得中日关系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

今当,中国国内已有近万家网站发布信息,海外更有无数的网站可以供国内网民自由浏览。“公众不再仅仅是依靠唯一的信息源形成共识和公共意见。在重大事件爆发

① 袁祖社:《权力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② 刘建明:《天理民心——当代中国的社会舆论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3页。

时,公众会通过对各种不同的信息源获得的信息比较、分析和平衡后,排除信息源的偏见,形成自己的意见,形成网络舆论。”中国公民主体意识在公众舆论方面的表现,被日本媒体称为民间力量的凸现。可以看出,中国公众力量(民间力量)初现端倪,表现出中国社会舆论趋向“多元化”特征。

四、结语

“中日两国互信下降”的民意调查结果,一方面是中日两国在历史、领土、台湾、经济和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摩擦造成的;另一方面主要是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形态发展变化中形成的碰撞。特别是日本“总体保守化”与中国公民意识增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过程中,两国公众对于中日关系的是非判断的声音日渐显现,已经形成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舆论力量。

目前,“网络厌日”情绪与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刺激中国民众不无关系,反映出中国民众对日本政府损害被侵略国家人民感情的行为极为反感。中国社会科学院两次中日舆论民意调查结果相同,有44.5%(第一次调查为47.7%)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过多”。所以,日本应该

认识到中国政治民主化及公民的主体性得到确立的现实,充分意识到中国对日舆论和价值评价的相应变化。放弃“以己度人”的尺度和陈旧思维方式,正确分析和判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国情,建立中日良性的政策互动关系,改变中日政治互信日趋淡薄的局面。

但不可否认,在媒体上常能看到部分对日舆论的不理性色彩,推动“网络厌日”情绪的部分网民严重缺乏理性分析,这一状况不利于维护中国利益表达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同时,这种状况正处于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中日舆论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国媒体报道日本时“客观公正”者占57.2%,比第一次调查的67.3%减少了10.1%,此减少部分多转移到“不清楚、不回答”。对于在互联网上出现的谴责对方的激烈言论,两次调查的结果都是超过半数者认为“正负作用兼有”(本次调查结果是53.4%,第一次55.9%)。这说明中国网民已经逐渐趋于理性。总之,中国还需要在中日舆论双边互动中,采取“理性沟通”,增信释疑,双赢共进,改善中日双边关系。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博士、副研究员。